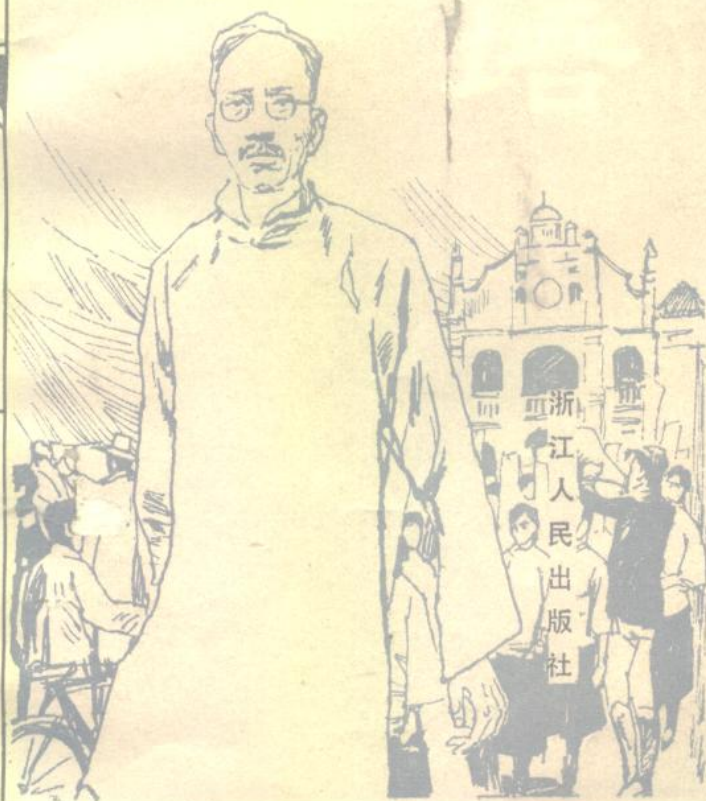


浙江历史小丛书



浙江历史小丛书

蔡元培

胡国枢 姚辉 应家淦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2B29/11

责任编辑 蔡潮峰

封面设计 池长尧

蔡 元 培

胡国枢 姚辉 应家淦

*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3.5 字数39,000

1985年1月第 一 版

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000

统一书号: 11103·124

定 价: 0.30 元

目 录

立志献身民主革命事业	1
最早的学潮	11
创立爱国学社	17
留学海外	27
第一任教育总长	34
出任北京大学校长	42
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	58
景仰马克思	69
与鲁迅的真挚友谊	75
不拘一格育人才	83
文明婚姻传佳话	91
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	97

立志献身民主革命事业

滔滔的钱塘江越过崇山峻岭，向东流去；湍急的曹娥江从东南飞奔而来，汇入杭州湾。在钱塘江南岸，曹娥江以西，有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——古城绍兴。这里有高高的会稽山，清清的鉴湖水。在这千岩竞秀、万壑争流的越国故地，自古及今，不知哺育了多少英才人杰。我国近代科学、教育事业的奠基者，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就诞生在这里。

蔡元培生于一八六八年一月十一日（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），字鹤卿，号子民，也用过世振、周子余等笔名。他的祖先原住在诸暨，后来迁到艺山，以卖柴为生，直到他的高

祖父时才积累了一些资金，开始经商。他父亲宝煜，是一家钱庄的经理，为人正派，族里的人都赞扬他是“爱无差等”，很有一点平等待人的气派。母亲周氏，是一位贤慧能干的家庭妇女。元培十一岁时死了父亲，当时他的哥哥十三岁，弟弟才九岁。两个姐姐未成年就不幸夭折了。父亲去世后，家境逐渐清寒，亲族朋友中有人提议集资赡养寡妇弱子，被他母亲坚决谢绝了。她靠典卖首饰衣服，克勤克俭，把三个儿子养大。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，教育他们不要依赖别人，更不要获取不义之财。她处世待人和蔼善良，小心谨慎。家庭的陶冶，给蔡元培以很深的影响。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了宽厚待人的习性，在母亲那里学到了不贪吝、不妄言的脾气，从小养成了温和厚道的个性。

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。开始读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神童诗》，接着读四书五经。对于儿童来说，读经是件枯燥乏味的事。正象当时一首儿歌说的，“大学大学，屁

股打得烂落；中庸中庸，屁股打得好种葱！”蔡元培也和其他儿童一样，硬着头皮死背硬记。儿童时代的封建教育，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乐趣，留下的只是痛苦的回忆。这种难忘的记忆，大概也是他以后勇于改革封建教育制度，废除全国小学读经，使千万儿童从束缚心灵的读经之苦中解放出来的一个缘故吧。

十三岁起，蔡元培跟老秀才王子庄先生学习。王老先生博学通经，熟谙八股文，是一位崇尚宋明理学、讲究封建道德的道学先生。他赏识元培的聪明好学，故对他管教得也特别严格。他自己什么书都看，比如有一天他与朋友谈天，就随口念了《西厢记》里“你半推半就，我又惊又喜”的谈情说爱的唱词，被学生听见了。但是他绝对不让学生读“闲书”。一次，蔡元培借来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被他发现而禁止阅读。又有一次，蔡元培翻阅一本《战国策》，他也说看不得。这倒不是王老先生特别刻板，实在是当时风气如此。考场里做文章

一定要引经据典，如果把《战国策》等不是经书里的话误用在文章里，就不会被录取。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就是为了中举做官啊！不过这位老师也有受学生欢迎的地方：爱讲故事。他经常给大家讲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吕留良、曾静的故事。吕留良（1629—1683），浙江桐乡人，是明清间著名思想家。他发誓不作清朝的官，削发为僧，是一位很重气节的人。后来，湖南永兴人曾静（1679—1736）因读了吕留良的书，受到影响，秘密组织反清活动，被清廷逮捕后杀害了。而早已死了半个世纪的吕留良也因此受到株连，被“剖棺戮尸，焚毁著作”，成为清代的一件大案。王老先生每次讲这个故事，总是十分激动。王子庄一生尤其佩服的要算刘蕺山。他把自己的住处取名为“仰蕺山房”。刘蕺山（1578—1645），名宗周，明朝山阴人，是我国著名哲学家。他曾经在绍兴城里蕺山上创立了证人书院（也叫蕺山书院），并亲自讲学，人称蕺山先生。刘蕺山曾官至礼

部尚书，后因反对奸臣魏忠贤，被削职还乡。崇祯时又重新起用，任京都府尹。他以直谏出名，后因弹劾扰民的大臣，再次遭到排挤。南明灭亡，清兵攻陷浙江后，他坚决不做清朝的官，绝食而死。刘宗周、吕留良、曾静等明末清初抗清志士的民族气节和民本主义思想，对蔡元培早期思想有很大的影响。

蔡元培十六岁考中秀才后，就不再去私塾念书，开始自学。他家境清寒，没有钱买书，幸而他的六叔铭恩家有不少藏书，他可以去自由翻阅，还不时得到这位中过举人的六叔的指点。元培一度在当地设馆教学，一边当塾师，一边自学。二十岁时，他由六叔介绍，到本城藏书家徐树兰的“铸学斋”做校订工作。进“铸学斋”是他的一个重要机遇，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八九年的四年的校书工作中，他遍读了所有藏书，还对一些重要书籍作了详细批注。他这样锲而不舍地博览群书，为以后渊博的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蔡元培到了晚年，还对这段自学生活念念不忘。他在《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》里，就谈到自学的得益，对其中三本书印象尤为深刻。一本是语言学家朱骏声的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，一本是历史学家章学诚的名著《文史通义》，一本是名学者俞正燮的涉及多种学科的《癸巳类稿》和《癸巳存稿》。特别是那些论述男女平等的文章，对蔡元培更有直接的影响。他以后大力倡导男女平等，开放学校女禁，实行男女同校，提倡男女婚姻自主，尊重妇女的地位与权利等等，就是导源于这个时候的读书收获。

蔡元培二十三岁到杭州参加乡试，考取了举人。第二年上北京参加会试。会试先是初试，分为三场。第一场，他写的文章一点不象八股文，考官十分奇怪；第二场、第三场，文章格局严整，内容旁征博引，主考官大加赞赏，郑重推荐。但他自己认为，第一场交了一篇“怪八股”，肯定没有录取希望，所以没等

复试通知就回绍兴了。等到得知考中的消息，他已来不及赶去复试。一直到了二十六岁时，他才去京补试。复试是殿试，考场设在皇宫里的保和殿。当时正是早春气候，寒气袭人，一些应考的贡士却头冒热汗，在怪题、偏题面前，瞠目结舌，很难下笔，而蔡元培因文史知识渊博，答得很出色。如回答一道关于西藏的题目，他就详细叙述了西藏的广阔地域和错综山川，可见他在边疆史地知识方面也有深厚的功底。这一次他被录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。对这位新进士，光绪皇帝的老师、维新派的重要人物翁同龢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评语：

“新庶常蔡元培……年少通经，文极古藻，隽材也！”大加赞赏。

府里考秀才，省里考举人，京里考进士，蔡元培经过三考出身，又因殿试文才出众，即被点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（官名，由文才特别好的进士担任），过了两年，又被授职翰林院编修，这时的蔡元培，真是少年得志，青云直

上。但是蔡元培自己并没有满足，他在无边的学海里，开始了新的航程，这是他与许多同年、同窗不同之处，也正是可贵之处。他在清王朝的最高学府翰林院任职的几年里，并不是做官享福，而是继续发愤求进，读了大量的书。他读的书，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：一类是宣传改良思想的，如《盛世危言》等；一类是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，如《电学纲目》等；再一类是介绍世界历史与现状的，如《环游地球新录》、《日本史略》、《日本新政考》等。这些知识与旧学不同，当时叫新学，这给蔡元培的思想增添了新鲜的血液，为他打开了了望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窗户。他想，维新变革也许可以改变封建中国的命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，给蔡元培思想的发展加了催化剂。

一件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之战。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国北方领海，爱国水军将领邓世昌、刘步蟾、丁汝昌等率军奋勇迎战。但是朝廷昏庸，内政腐败，国力衰危，堂堂以老大自

居的大清帝国被小小的日本击败了，旅大失守，辽沈震动，京都也受到威胁。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不但割去了台湾、澎湖、辽东半岛，还开放了重庆、沙市、苏州、杭州为日本商埠，并且赔偿白银二万万两。蔡元培听到这个消息，极为悲愤，认为这是应该痛哭流涕的奇耻大辱！

另一件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变法。其实这次变法，只是在不损害封建制度的前提下，搞一点改良而已，如废科举，办学校，设报馆，开工矿等等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改良，也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，维新派很快就受到了镇压，爱国志士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被杀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出走日本，光绪皇帝被幽禁。蔡元培是同情变法的，但他又不完全同意康、梁的做法。他认为戊戌变法所以会失败，是由于维新派没有先培养革新人才，因此敌不过顽固势力。

甲午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的步伐加紧了。戊戌变法的失败，说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。国运垂危，前途茫茫。这时，蔡元培已是年过三十的壮年人了，从举人到翰林，由家乡到京城，为国家、为人民干了些什么呢？在翰林院做官，他早已没有兴趣了。他曾在书斋里写下“都无作官意，惟有读书声”十个大字。这个时候，他已明白清朝的政治改革已“无可希望”了。同时，他的不满现实的思想，也日益为院中掌权的旧派人物所不容。“满腹文章何所用？秋风起兮不如归！”蔡元培断然挂冠南下，于一八九八年九月间，携眷出京，经上海、杭州，返回故乡绍兴。开始，他接办绍兴第一个新式学校——绍兴中西学堂，担任监督（校长）。从此，他与教育事业结下了终生之缘。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，个人阅历的增进，他的思想逐渐从爱国倾向革命。他立志将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以至整个身心，贡献给民主革命事业。

最早的学潮

清朝政府在镇压戊戌变法、签订《辛丑条约》以后，遭到国内各阶层群众更强烈的反对。为了蒙蔽人民，他们于一九〇一年宣布举办所谓“新政”。“兴学堂，派游学”是“新政”的一个内容。盛宣怀为了捞取政治资本，借“兴学育才”之名，在他创办的“南洋公学”里开了一个特班，准备以后从这个班里选拔一些成绩优异者去读“经济特科”，把他们培养成为懂得洋务的“经济”人才。这个班共有四十名学生，都有相当好的古文水平，加上所开课程很多，有政治、法律、外交、财政、教育、经济、哲学和伦理等，因此对教师的要求

也特别高，既要精通经史，又要有“新学”知识。当时在国内要找这样的人才是很困难的。一九〇一年八月，蔡元培经人介绍，受聘为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。

蔡元培到职后，一反学堂的教学常规，大力向学生介绍与推荐当时出版的书籍，让学生课余自由阅读，接触新思想，学习新知识。他规定学生要记日记，每天写阅读新书报的心得。他又根据形势，每月命题让学生作文一次。在评改学生日记、作文时，蔡元培积极提倡科学、民主，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要找两三个学生谈话，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，让他们谈谈对时局的看法，或者交流交流读书心得。课堂上，蔡元培是严师，课堂外他却是一位仁慈的长者，耐心听取学生的意见。师生之间这种融洽友爱的气氛，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。

二十世纪初的上海，民主思想已经开始形成一股潮流，南洋公学的学生，在蔡元培等

进步老师的引导下，接触了这股新思潮。尽管学校当局千方百计地加以钳制，但学生们终于在一次风潮中，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思想网罗。

那是一九〇二年秋天的一个晚自修前，南洋公学中院第五班的学生，正在教室里三五成群地交谈。有个学生一面说话，一面玩弄墨水瓶，结果误把它放到老师的椅子上。自修铃响后，举人出身的国文教师郭某到教室监督自修。此人思想特别顽固，平时只准学生读《大清会典》和《圣武记》一类的书，严禁阅读新书报，更不准议论时政。学生们平时就对他很反感。当他到教室后，发现座位上有个墨水瓶，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但他偏要豆腐里挑骨头，大发雷霆地责骂学生，并且当场责令坐在前排的一个姓伍和一个姓贝的学生将此事查出，否则就说是他俩搞的鬼。伍、贝两人当然不服，顶撞了几句。这一下，可把郭某给惹恼了。第二天，郭某将此事报告了南洋公学总办汪某，汪总办以“不敬师长”为理